

后现代性下的 生命与多重时间

[英] 基思·特斯特 (Keith Tester) 著 李康 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揭开请拨 95105715 或短
信发送至 106695887808



培文书系·社会理论新视角

后现代性下的 生命与多重时间

[英] 基思·特斯特 (Keith Tester) 著 李康 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 01-2008-3241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后现代性下的生命与多重时间 / (英) 基思·特斯特著; 李康译. —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0.2

(培文书系·社会理论新视角)

ISBN 978-7-301-16704-5

I. 后… II. ①基… ②李… III. 后现代主义—研究 IV. B08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017502号

The Life and Times of Post-modernity, 1st edition, by Keith Tester

EISBN: 0-415-09832-7

Copyright © 2008 by Routledge. All rights reserved.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Authorized translation from the English language edition published by Routledge, a member of the Taylor & Francis Group. (本书经授权译自泰勒 & 弗朗西斯集团成员 Routledge 出版的英文版本)

Copies of this book sold without a Taylor & Francis sticker on the cover are unauthorized and illegal.

本书中文简体翻译版由北京大学出版社与泰勒 & 弗朗西斯旗下的 Routledge 合作出版。本书封面贴有 Taylor & Francis 标签, 无标签者不得销售。

书 名: 后现代性下的生命与多重时间

著作责任者: [英] 基思·特斯特 著 李康 译

责任编辑: 徐文宁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16704-5/C·0566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电子信箱: pw@pup.pku.edu.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0112

出版部 62754962

印刷者: 北京宏伟双华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720 毫米 × 1020 毫米 16 开本 11.75 印张 210 千字

2010 年 3 月第 1 版 2010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18.00 元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举报电话: 010-62752024 电子信箱: fd@pup.pku.edu.cn



目录

序.....	1
第一章 界 限.....	7
第二章 特性 / 身份 / 认同	33
第三章 怀旧 / 恋乡	59
第四章 技 术.....	87
第五章 责 任.....	113
第六章 他 人.....	137
第七章 结 语.....	163
参考文献.....	175
中外人名索引.....	178
中外主题索引.....	179
译后记.....	181

“如果我不是有目的地到这里来，而是意外地发现自己站在这个地方的话，”他蓦地寻思，“那真有点绝望的味道呢。”

——弗朗兹·卡夫卡

真正的栖居困境乃在于：终有一死者总是重新去寻求栖居的本质，他们首先必须学会栖居。

——马丁·海德格尔

……绝对现代化，就意味着成为自己的掘墓人的同盟者。

——米兰·昆德拉^[1]

我在早前的两本书，即《两种主权》和《市民社会》中，力图探讨欧洲现代性的一些希望与灾难。尤其是我试图谈谈，现代性的事业为何似乎老是骤然之间声势浩荡，旋即湮没于无关紧要，并且在一定程度上恰恰是在这份事业的实现似乎已经成为明确可能的时刻。

那些论著其实隐含着这样的假设：要撰述现代性，把它当做是一样引人兴致的东西，而不是某种供人生活、体验、栖居其间的普遍境况（condition），就意味着本人并非不言自明、轻松惬意地处在现代的界限之内。可以说，我已经摆脱了这样的界限。但在某种程度上，我想必也得在某种东西的界限之内，才能知晓自己在什么别样的东西的界限之外。因此可以说，本书关注的是这样一些境况，它们构筑了理据，以便能够察看现代性。

[1] 以上中译分别根据卡夫卡《城堡》，《卡夫卡全集》第四卷，赵蓉恒译，河北教育出版社，第17页，有改动（“绝望”原中译作“山穷水尽”）；海德格尔《演讲与论文集》“筑·居·思”，孙周兴译，商务印书馆2005年，第170页；昆德拉《不朽》，王振孙、郑克鲁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年，第162页。本书所有注解均为中译者注。

本书当中，我试图更为清晰地刻画，对于自己据以领会现代性的那种境况，我是如何解释的。我想通过这本书，进一步倡导阿尔文·古尔德纳的准则，将摄影师置回图像之中。至于这幅图像是清楚明晰，引人入胜，还是东拉西扯，不成体系，就凭读者诸君定夺了。

因此，本书关注的是，在有关现代性乃至后现代性本身的讨论当中，一些解释上的利害关键与可能条件。不过，我希望本书不仅仅具有自传性的意义（我希望它不仅仅讨论一位孤独的摄影师）。不管怎么说，我是一位社会学家，我力求做些被称作社会学的东西。而作为一名不错的社会学家，我认定自己与芸芸众生一起，居处在一种独特的社会文化情境之中。我并不是一个孑然自处的鲁滨孙式人物，像他那样与世隔绝。要理解你与我，首先就是要理解合力之下使我们成为我们之所是的那些关系。所以说，本书探讨的是社会文化世界，而并非纯属个人事件的探讨。

因此，《后现代性下的生命与多重时间》通过这些方式，展现出努力超出《两种主权》与《市民社会》中勾勒的疆域而思考。所谓“超出……而思考”，有一部分也意味着我现在对于后现代性的诸般可能与蕴涵，已经远不像早前几本书中那样满怀热诚（即使在早前，对于有关后现代性的一些重大主张，我也总是挑剔质疑，妨碍着那份热诚）。

话说回来，《后现代性下的生命与多重时间》与另两部著作还是有些共同之处的。尤其是和其他努力相仿，《后现代性下的生命与多重时间》显然也是一部解释之作。在许多方面，它还是一部思辨之作。本书又一次不打算自诩要给出正确答案，也不打算妄言掌握着揭启终极真理的钥匙。我甚至不打算伪称它提出来的必然都是迫切相干的问题，当然，我还是希望它引出的问题都有意思，也有益处。本书无非是这样一份试论（essay），想要搞明白，读着后现代、写着后现代的那些人（就像你和我），在看这个世界的时候，为何与其他人在某些方面截然不同。

我知道，这些旨趣基本上是属于解释性的，大有可能使我的作品（但愿这个词儿不那么夸大其辞）面临不少批评。从许多方面来看，这样的遭遇也是可以接受的，甚至应该积极鼓励。说到底，我现在搞的这种社会学，是要提倡一些别样的（alternative）观看之道，却不曾给出最佳途径，也并非只有

一种替代方案。然而，在我看来，值得花些时间来想想潜在可能的批评意见，说本书就像《两种主权》和《市民社会》一样，代表着一种对于世界的特殊书写，殊少关注“实际生活”中发生的事情，甚至不置一辞。可以说，我倾向于将世界化简为一种书写、一种解读，而我原本应当更加关注对于世界之中的实践和有关世界的实践的思考（也就是说，我把一切都化约为观念，而不是物质性的行动与环境）。

<3>

我想，自己表面上似乎老想避免社会学角度的理据这种正统的舞台道具，反倒是对与作者们对话乐此不疲，这大概在一定程度上也助长了这种批评。我老是在讨论其他类型的书籍，在从中提取我的“证据”时，往往是出于两点理由。首先，相比于绝大多数社会学文献，小说实在是要有意思得多，也深刻得多。毫无疑问，它们写得精彩多了。但这基本上属于一种审美角度的理据。其次，还有一种道德角度的理由，也是理查德·罗蒂所强调过的。罗蒂说过：“小说、电影和电视节目已经缓慢但却稳固地取代了布道与论著，成为道德变迁与进步的主要载体。”（Rorty, 1989, p.xvi）^[2] 因此，按照罗蒂的说法，要寻找道德进步与“前行之路”上的标杆，不能诉诸学术界的产物（所以也不能在本书中寻找），而应当转向其他类型的文化生产。不幸的是，我对电影和有益的电视节目所知甚微，所以只能去谈那个对我来说不那么玄秘的世界（也就是文学）。换句话说，我力求秉持罗蒂的立场来进行研究，当然，我也的确是怀疑“道德进步”之类的观念有多大用场（不管这种进步可以被界定得多么自由，多么正派）。

其实，我想要揭启的是，支撑并构成我们在社会层面和社会维度上的现实^[3]的那些神话/迷思（myth），究竟意义何在。玛丽·道格拉斯对神话/迷思的界定很有帮助，即“对于不管怎么说构成了社会生活的那些令人不甘的妥协的思索”。道格拉斯继续说道：“透过神话/迷思中曲折隐约的陈述，人们能够间接认识到，有一样东西难以公开承认，但人人心中肚明，那就是理

[2] 中译参考理查德·罗蒂《偶然、反讽与团结》，徐文瑞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8页，有改动。

[3] 此处原文为“societal and social reality”，“societal”是纵向分割的社会层面，相对于超社会、亚社会之类；后者是横向分割的社会维度，相对于经济维度、政治维度等。

想不可及。”(Douglas, 1975, p.156)一出神话/迷思就是这样一则故事,协调着、应对着社会层面与社会维度之存在的种种冲突与诸般艰难。神话/迷思思索着我们生活中的诸般艰难,要么以某种方式与其取得调和,要么将它们逐出需要言说的事情的情境。不仅如此,神话/迷思还能够说明,我们常常以非凡的信念、担当(commitment)与热诚来守护的那些理想,为何永难企及;神话/迷思会帮助我们应对我们看似没个尽头的挫败。

<4> 我在最近几本书里,一直在力图揭示,如何通过一系列的神话/迷思,来解释现代性(这些神话/迷思被称作“社会”、“共产主义”、“自由”等等,并常常通过“经典社会学”和“社会科学”所自称的科学性而获得理据),能够言之成理,并且在相当程度上也确实不乏意义。但我并不接受这些神话/迷思的字面意义,而是努力解释它们的利害关节、言外蕴涵以及可能条件。所谓关注有关我们世界的写作,其实就是关注有关我们世界的神话/迷思,就是去探寻人们都靠着哪些故事,来作出妥协,为实际活动提供理据,并使挫败可以接受。关注有关世界的写作(其实,即使最朴素无华的社会学,做起来也是一种写作),有助于领悟生存究竟意味着什么,哪怕在社会维度和社会层面的情境中遭受挫败。这样的强调重点也有助于说明,为什么世界被如此寻常地体验为、解释为一块受界限限制的地方。

综上所述,但愿您能够在阅读本书的同时,也亲身参与本书的写作。这份文本等待着接受挑战:我希望它引导您提出问题,并自己给出解答。我还希望此书能够在一切反思性、解释性社会学都应当做的事情上有所推动(或许这些类型的社会学常常还做得不够充分,老是不得不生活在其姊妹——立法性社会学和平白乏味的社会学——的阴影之下)。我希望《后现代性下的生命与多重时间》将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使世界的意义更趋丰富多元,让我们能够自己打造这个世界,而无须别的什么人来告诉我们,他们才知道其实什么是最好的。那些目标和希望都是非常有节制的。如果说后现代知识分子应当从现代性中有所借鉴的话(尽管对于后现代性可能意味着什么我还是有所保留的,但作为一名后现代知识分子,这是我的命运),那就是谦卑(humility)这一课。更具体地说,我宁愿认为,本书不会为以下信念推波助澜:就因为什么东西我们难以领会,它就无权存在。

本书探讨的是社会文化情境中的生活，而书本身也是社会文化关系的产物。我为写作一些有意思的东西所付出的一切努力，都大大得益于我的阅读写作伙伴们组成的小型共同体无私奉献的时间与帮助。因此，我将再一次感谢琳达·卢瑟福德 (Linda Rutherford) 和齐格蒙德·鲍曼长期以来对我的深切指教。克里斯·罗杰克 (Chris Rojek) 和安妮·吉 (Anne Gee) 也继续使我确信，为 Routledge 出版社工作，是一份令人愉悦而富有收获的经历。以上诸位帮助我的方式各不相同，但同样重要。不过，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必然会希望与这部作品的只言片语扯上关系（我猜想，在我表示感谢的这些人士当中，至少有一位会强烈反对本书的议论）。

第一章 界限

<6> 格 奥尔格·齐美尔曾经有这么一本书，其卷首语拿来做本书的开篇辞似乎同样十分贴切。他写道：“事实上，人方方面面的存在，时时刻刻的行为，都处在两个界限之间，这一点决定了人在这世上的定位。”（Simmel, 1971, p.353）^[1] 接下来，齐美尔简要概括了他所说的这些界限是什么意思。或许不可避免的是，他认为，规定了人在世上的位置的这些界限，也就是赋予人某种位置和方向的这些界限，可以视为一系列的二元对立：较高等的和较低等的，较重大的和较次要的，较美好的和较糟糕的（话说回来，必须承认，对于人与共同体的根基与确切意义，齐美尔似乎有些语焉不详）。但是，如果这些两极对立不复存在，如果它们不再有能力为人提供定位，让诸般活动与制度具备意义，那么这个世界对于我们也就或多或少（另一对二元对立）失去了意义。说到底，“上下之间的界限，就是我们置身世界的无限空间而确立方向的手段。”（Simmel, 1971, p.353）^[2]

要是没有界限，人在这个世界上将全无能力确立方向。事实上，人也不可能在上找到位置。换言之，在齐美尔看来，界限就像是有意图的活动和理解的前提条件。如果没有界限，“我们所处的世界的空间”其实就是无限的。它会如潮涌来，将我们淹没，似雷惊起，令我们震愕。这种无界限性的状况推而论之，若是没有界限所提供的两种极为重要的可能性，即确定的位置和某种定向方式，人就会将世界领会成广袤无垠。因此，相比于无限，人也相应被规定为渺小。个体抑或整个人类要想在上显得伟大，除非将世界的限制牢固确立于不难理解的概念界限与解释界限之中。

<7> 在这里，齐美尔似乎是在暗示以一种本质上审美式的眼光、也是康德式的眼光来看待事物。若是没有界限，为从事理解的主体行动者寻觅并确立位置，人类相对于事物就会变得渺小。你甚至可以说，人宛如沧海一粟。世上的事物就此被领会为缥缈高远（sublime），或许也因此带有几分威慑。齐美尔明确指出，界限不仅可以确立方向，还可提供安全感、解释上的确定性，以及世界的可理解性。不妨说，幸亏有了这些界限，浩瀚的大海才有可能成为一泓清池，而人才有可能成为池中的金鳞。界限确保了人不一定非得面对

[1] 中译系自译，可对照西美尔《生命直观》，刁承俊译，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1页。

[2] 中译系自译，可对照同上引，第1页。

“我们的世界的无限空间”那种暧昧的缥缈高远。

至此必须承认，对于这些界限的地位，齐美尔说得其实非常含糊。他视之为给定的东西，只打算探求其连带意涵。诚然，齐美尔说明了界限有助于使世界、人及个体的此世存在变得可以理解，但他似乎没有说明这些界限缘何而来。齐美尔并不准备回答它们究竟是个体层面的表征、社会层面的建构，还是对于类存在的表征？抑或可以理解成近似于“理念”或先验范畴？齐美尔并未明确指出，究竟是界限规定着“社会”层面，还是相反，“社会”层面以某种方式规定着界限。事实上，他只是将界限和此世存在作为给定的东西，并力求揭启两者之间究竟是如何相互作用的。

齐美尔主张，界限与存在的东西（齐美尔谓之“生命”）必须结合在一起才能得到理解（换言之，借用社会学话语中另一股传统的术语，齐美尔十分明智地避开了结构与能动之争的陷阱）。他坚信，若无界限，此世的生命（即存在）将是非常贫乏的，也肯定是极难领会的。无论如何，

分享那些包含着我们此时此地的长短优劣、明暗显隐的现实、趋势与观念，……将会赋予生命两种虽然常常矛盾但却相互补充的价值：丰富性与确定性。

(Simmel, 1971, p.354) [3]

因此，在这里，齐美尔的意思是说，界限就在于千方百计要规定意义，但界限的存在和被接受本身就奠定了坚实的根基（也就是给定的意义），社会维度和社会层面据此可以规定自身。 <8>

所以说，受到规定和自我规定是同一个连续统的两极。齐美尔写道，

我们依据这些连续项得到限制，我们自身也囿于其区段之中，形成了某种坐标体系，仿佛经由这一体系，可以确定我们生命的各个部分与内容。

(Simmel, 1971, p.54) [4]

[3] 中译系自译，可对照同上引，第1—2页。

[4] 中译系自译，可对照同上引，第2页。

或者换句话说，要是没有界限，像这样一本书，即使宣称要对社会维度和社会层面的东西作出解释，其实是什么也说不。但像这类的书，根植于现有社会学话语的界限之中，并力求作出些微超越，事实上也是可能存在的。这不仅是要凸显界限的位置所蕴含的某种矛盾，而且更重要的是间接指出，人们为什么会认为，自己所参与的种种社会文化活动是自我构成的（文化被理解为此前文化的产物）。究其根本，在齐美尔看来，重要的是要认识到，原则上，某种界限的存在，其实是或许旨在超越此类界限的社会活动或文化活动的前提。

按照齐美尔的说法，“界限是不受条件限制的，因为其存在本身构成了我们在世上的给定位置。”（Simmel, 1971, p.354）^[5]然而，与界限的无条件性、构成性地位恰好相反，同样可以说，“没有任何界限是不受条件限制的，因为每一种界限原则上都可能被改变、逾越或绕过。”将界限的这两种维度综合起来看，也就是将无条件性的存在与有条件限制的实践相结合，齐美尔自信地作出结论：“这一对说法似乎阐明了生命行动的内在统一性。”（Simmel, 1971, p.354）^[6]换言之，这就是社会文化分析的魔法石。

因此，根据齐美尔的看法，界限为存在指引了方向，为存在确定了位置，也是超越界限本身的前提。这是因为，若无界限，若无定向和定位，社会文化活动本身就会沦为在世上漫无目标的胡乱折腾。要是没有界限，社会文化活动就不会具备任何形式，顶多是无形式的内容。如此一来，齐美尔提出，是界限创造了形式，而形式又是意义和解释的基础。齐美尔在“现代文化的冲突”这篇重要文章中，十分清晰地揭示了这一点。他认为，所谓文化，指的是这样一种过程：“生命创造出某些特定形式，并通过这些形式表现其自身，实现其自身，包括艺术、宗教、科学、技术、法律等方面的作品，其他种种，不胜枚举。”（Simmel, 1971, p.375）^[7]

可以说，文化蕴涵了生命有可能实现自身的全部事业。但文化也蕴涵了生命以受界限限制的形式得以实现的那些事业。文化产品本身就属于让生命

[5] 中译系自译，可对照同上引，第2页。

[6] 中译系自译，可对照同上引，第2页。

[7] 中译系自译，可对照西美尔《现代人与宗教》，曹卫东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现代文化的冲突”（王志敏译），正文第23页。

能够被理解的形式：“这些形式蕴涵了生命之流，提供给它内容与形式，自由与秩序。”(Simmel, 1971, p.375)^[8] 比如说，正是凭借着现代艺术（像立体主义）的种种形式，我们现在才得以换一种眼光来看世界。在一定程度上说，那种新的看法、新的自由能够延续多久（即其文化寿命），取决于立体主义的意义与性质在何等程度上确立于界限之中（也就是说，很容易识别并区分毕加索创作的立体主义阶段与其更符合传统惯例的画作）。自由与秩序携手并行。现代艺术确立了新的形式，后者又创造出新的生命维度。但只有当艺术形式具备某种独立于生命的地位，才能实现这一点（表现为“为艺术而艺术”的原则）。

话说回来，尽管有必要强调作为形式的文化与作为活动的生命（生命作为对于界限的超越）之间的这种辩证关系，但界限蕴含着持恒性，这就意味着它们与原则上构成了它们的那些活动保持着距离。诚然，界限为社会文化活动开辟了空间，奠立了根基。但它们要想履行这些蕴示着解释上的自信的功能，本身在一定程度上就必须被想当然接受。受界限限制的形式是限定的（fixed）；它们确立了生命的意义。是界限使得生命蕴含意义。不过，生命作为某种具有定位的东西，更耐人寻味的是作为某种导向（即生命作为向着不同于此处的别处前行），蕴含着意义，这本身就意味着生命的流动溢出了持恒的界限，这一点至关重要。也就是说，生命是一种过程，是一种对于限定在形式中的时间与位置的超出。界限让生命变得可以领会，它们坚固而持韧，相形之下，生命流变不居。

限定（fixity）与流变（fluidity）之间的矛盾，就是齐美尔所宣示的现代文化冲突的实质。对于这一点，齐美尔的论述同样精彩：

这些形式为创造性的生命构筑了框架，不过，创造性的生命很快又会超越这些形式。受界限限制的形式要求获得固定的特性^[9]，获得自

<10>

[8] 中译参考同上引，正文第23页。

[9] 英文原文为“identity”，此词在全书中有“特性”（即同一性）、“身份”和“认同”等义，中译为了凸显其间的相互联系，更准确的说是逐渐递进的关系，在绝大多数地方采用了“特性/身份/认同”的译法。

身特有的逻辑和合法性。而这种新的刚性 (rigidity) 又势必会与创造了形式、使形式获得独立的精神动力保持一定距离。

(Simmel, 1971, p.375) ^[10]

形式与生命之所以各自独立,就是因为生命前行不止,而由界限所确立的形式却必然倾向于一定程度上的限定性。如此一来,从生命的角度来把握那些让生命变得可以领会的那些界限,就是实际上或潜在地具备约束性。它们肯定会被理解为对于自由构成实际或潜在的约束。按照这样的解释,界限就展示出物化的倾向。

我们从齐美尔对于时间这一形式的界限的讨论中,可以提炼出生命与形式之间、界限与超越之间的这种辩证冲突的例证。齐美尔提出,有了时间的概念,生命被分割成一系列受界限限制的领域,被称作过去、现在 ^[11] 与未来。生命经由时间而被赋予某种导向,有了此前与此后,也有了增强和趋弱。倘若失去了时间的界限(昨天、今天和明天)所赋予的导向,生命就只不过是同样一种东西的持续不断、不可避免的重复。不仅如此,时间这一受界限限制的形式以如此方式运作,还使得现实这一标签只能赋予那些属于现在的状况和关系。不过,按照齐美尔的说明,“就这个词严格的逻辑意义而言,现在的涵义无非是某一时刻的绝对的‘无延伸性’(unextendedness)。它在时间中的渺小,一如一个点在空间中的地位。”(Simmel, 1971, p.359) ^[12] 换言之,现在这一精确时刻,宛如巨幅画布上的一个小孔。现在始终处在此时此地(当艾略特在其《小吉丁》一诗中将世界化约为“现在,在英格兰”时,试图把握的就是类似的意义)。^[13] 不过,一旦现在被理解为时间中的一个时刻,情境就会发生相当的变化。因此,现在“所意味的无非是过去与未来的对接,单

[10] 中译系自译,可对照西美尔《现代人与宗教》,曹卫东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现代文化的冲突”(王志敏译),正文第23页。

[11] 英文原文为“present”,本书许多地方也译作“当下”。

[12] 中译系自译,可对照西美尔《生命直观》,刁承俊译,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7页。

[13] “……你以为你所以来的目的/仅是一个外壳,意义的外壳,/目的只有在实现时才会从外壳中迸出——/如果真有目的的话。要不是你就没有目的,/或是这个目的超过了你的预计,/而在实现时又已改变。/……可这是最近的,在地点和时间上,/现在,在英格兰。”见艾略特《四个四重奏》,袁小龙译,漓江出版社,1991年版,第217页。

凭后两者就可以构成具有一定跨度的时间，也就是实时时间。可是，由于一个不复再现，另一个尚未到来，现实依然只能附着于现在。”(Simmel, 1971, p.359) ^[14]

所以，根据齐美尔的看法，可以把时间理解为一系列的界限，为在这个世界上界认并施加意义 (identification and imposition of meaning) 开辟空间。生命经由时间这一形式，成为与过程和变化具有内在固有关联的东西。当然，尽管时间使存在具备了意义，但这种存在本身并不完全契合于相当机械的界限的刚性。齐美尔又一次努力揭示，无论有什么样的界限施加在生命上，生命其实总要去超越它。时间这一形式的运作方式使得现实无非属于现在，从而使其本身在一定程度上外在于时间（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始终处在‘现在，在英格兰’），尽管如此，生命还意味着现实被施加在过去和未来（举个简单的例子：今天我所了解到的现实，就是我的昨天）。<11>

换句话说，现实在形式上的地位是作为限定的现在，而其在生命中的地位则具备固有的流变性，这两者之间具有某种矛盾，某种文化上的冲突。齐美尔如此谈论限定的实在：“以主体的方式度过的生命不会与之取得调适。这样的生命觉得自己是时间（即流变）维度中的某种实在，无论这样的感觉是否能够在逻辑上获得论证。”他还继续举例说明形式与生命之间的冲突，指出日常言语中所说的“现在”这个词，“从来也不只是其概念意义上的那种精确时间性”。相反，日常用法中“始终包括一点过去，也包括较少的一点未来。”(Simmel, 1971, p.359) ^[15]

就这样，齐美尔通过以时间为例，提出生命相对于形式，相对于使生命具有意义的界限，具有超越性。事实上，在齐美尔看来，假如生命不被理解为具备超越性，假如不假定生命会溢出静滞的界限标志，那么文化就会被体验为某种势不可挡的压迫，而生命本身也就很难说有什么生活下去的价值。其实在齐美尔眼里，我们饶有兴趣地谈论着界限，这本身就证明了有能力超出界限，了解界限是什么东西，从而让世界有所更新。诚然，全盘重构的机

[14] 中译系自译，参考西美尔《生命直观》，刁承俊译，三联书店 2003 年版，第 7 页。

[15] 中译系自译，参考同上引，第 7 页。